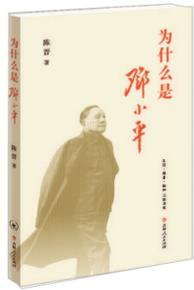




# 《为什么是邓小平》：解读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力量

陈晋



《为什么是邓小平》陈晋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此次上海书展，我为读者朋友带来了我的新著《为什么是邓小平》，借此表达我对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敬意。

今年是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为什么是邓小平》正是在此契机下推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重点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的六种精神风范。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启发。

此书的素材积累经历了很长时间。我长期从事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研究，还做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伟大的历程》等影视文献片的总撰稿工作。1993年，我参与创作拍摄12集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撰稿工作，开始收集资料，采访了许多当时还健在的和邓小平接触过的老同志。1997年1月这部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影响很大。2004年，参与好几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影视片的创作时，又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素材。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我对党史、改革开放史，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研究没有停下来过。这些，是我写作《为什么是邓小平》一书的重要基础。

因此，我在创作时，注意从史料出发，紧扣时代观照，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精神，通过12个视角，梳理和归纳了邓小平

独特的革命经历、举重若轻的行事风格、言简意赅的语言风格、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以及他善抓机遇的决断能力，尤其关注邓小平的人民情怀、精神境界、博大胸襟、睿智敏锐、坚韧果敢、朴素平等“主体特点”。之所以这么来书写，是想力求向广大读者阐释邓小平何以能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何以能领导中国推进改革开放这样的“第二次革命”；何以能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希望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邓小平的丰富思想、精

神风范和人格魅力。我把全书最终定为12章与一个综述来呈现。12章主要从12个方面做了呈现，解读了邓小平的革命经历，以见其信念坚定这一最鲜明的政治品格；解读了他“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的务实本色，以见其实事求是这一最重要的思想特点；解读了他“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风云胆识，以见其开拓创新这一最鲜明的领导风范；解读了他总览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瞻远瞩，以见其战略思维这一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解读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其他

# 我的『五四』研究三书

陈平原

20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称：“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这个立场，至今没有改变。不仅我硕士、博士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故注定要与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保持长期对话，更在我看来，五四时期的很多重要论述需要调整，但作为基本立场的“五四精神”并没有过时——尤其是在当下“传统文化”更受关注的中国学界。我不止一次表白：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因为，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七期）。

基于此立场，40年读书与写作，虽上下求索，左冲右突，但一直没有停止与“五四”先贤的对话。除了与夏晓虹合作主持、邀请诸多学生参与、图文并茂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9年），我关于五四的研究著作，其实只有以下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初刊、日后多次重版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初刊、2023年增订的《“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初刊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推出增订版，改名《未完成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北大出版社2024年刊行的增订版，采用了香港版书名。

我关于五四研究的三书中，用力最深且反响最好的是第一种——《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曾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以及教育部颁发的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且2011年便由贺麦晓（Michel Hockx）等翻译、博睿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刊行英译本。考虑到此书影响较大，尤其是其第一章“五四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第二章“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第三章“叩问大学的意义——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常被引述或模仿，这里想暂时搁下，转而推荐读者较少的后两种著作。

不管是初刊本还是增订版，《“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均非完整的著述，只能算专题文集——围绕大众传媒与现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报刊、书局、大系、讲义、百科辞书、文学史等），展开多姿多彩的论述。全书以《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开篇，以《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收尾，单看题目，都能大致了解其基本面貌。可以说，这是学科内部的“字斟句酌”。如此仔细推敲，对相关话题有所推进，但专业以外的读者很可能不知所云，也不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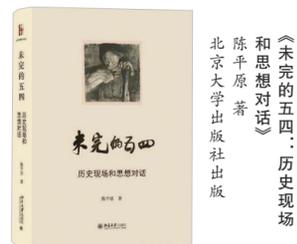
相对而言，《未完成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大不相同，那是跳出学院围墙，横刀立马，百无禁忌，挑战各种常识与主流论述。单篇文字，偶有材料丰富、立论谨严的；但整体而言，全书直面当下的社会思潮，带论战性质。初刊本出版后，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曾组织专题讨论会，同人意见犹未定，各自将发言稿整理成文，刊《文艺争鸣》2018年第九期。此专辑共十文，包括我的《为何必须不断与五四对话》，各有长短，但都感慨遥深。

比起初刊本，增订版做了很大调整，除了增加七篇新文，更重要的是吸纳读者及编辑意见，将原先注重作者立场、按写作时间排列，修订为方便读者阅读、按话题归类。不算自述性质的“我的五四之路”及访谈，该书主体部分包括“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多元并存的五四时代”“两代人的合力”“五四的阐释和传播史”等四辑，每辑各收三文。为了使全书眉目更加清晰，香港版甚至在每辑文章前面，加一段提要钩玄的文字——当然是摘自我的文章。

在一个“专著为王”的学术时代，刊行论文/评论/随笔集，其实很不好，因论述不够完整，且非一气呵成，不免有断裂或重复。好处则是摆明拾遗补缺，不追求系统性，人家说过的我可以不说。这么一来，作为单篇文章阅读，自



陈平原，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馆教授、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24年出版24卷《陈平原文集》。



《未完成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陈平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度更大。考虑到五四研究曾经是显学，相关著述甚多，不属于“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相反，在这个领域，当务之急是常识需要辨析，立场需要推敲，视野需要验证，方法需要更新。《未完成的五四》的拟想读者，不但是学界中人，更包括关心现代中国命运、且对当下中国学术及思想状态略有了解的“门外汉”。故本书追求的，是与历史风云对话，也与现实处境对话；另外，让“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处在对立、对峙与对话的状态。这样一来，或许专业性不够，但思想性却因而得以凸显。

表面上，我们每年都在纪念五四，逢五逢十，更是隆重；但作为研究者与观察者，我曾表达四个担忧，其中最严重的是“怕成为纯粹的书斋学问，没能因应时代话题，也无法介入现实生活”（《我的“五四”百年》，《国是咨询》2019年第6期）。

正是基于此信念，我谈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注重细节的描述（方法）、凸显论战的姿态（立场）、兼及古今的事业（晚清及五四两代人的合力）、平衡新旧的努力（主张新文化的光谱尽可能扩大），而最重要的是基于学术而又超越学术，即希望保持其与当代中国政治以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密切联系。

# 我怎么写起了东汉……

张向荣

当我写完《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的时候，一个关于东汉的故事已经呼之欲出了。这里首先关乎好奇心：王莽的新朝被东汉朝野所否定，为什么新朝关于儒家的遗产，却被东汉继承？大家对东汉最熟悉的，是开国的汉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开国群英，以及末尾的汉献帝时期的群雄逐鹿，中间150年的统治才是最具东汉气质的时代，为什么却相对较少被书写？

东汉最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忠臣孝子辈出，以至于“汉”的号名被后世反复提及，从刘备季汉到十六国的刘汉、成汉，如此强大的文化号召力，为何迎来的却是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

三国风流人物，乡野皆知，可他们从何而来，怎么被培养，父祖做什么？

我这么笃信都好奇，其他人就不好奇吗？于是我要打心自问，东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上世纪有位日本历史学者，用一串形容词盛赞东汉的鼎盛时代：“成熟、优美、和平、稳健、繁荣。”尽管东汉这个缺乏“存在感”的朝代当得起这样的荣耀吗？这恰恰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东汉的气质。东汉，是“秦制”的秦汉帝国被王莽的“儒教”新朝改造、杂糅形成的“新汉制”或“第二汉朝”。

东汉，在经学家的眼中是“经学昌明时代”。经学成为了事实上的“国宪”；东汉，确立了士大夫们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对家族的孝道大于对皇帝的忠诚，在地方上的声名高于为朝廷效犬马之劳；东汉，也赋予普通大众以日常生活的安定，不识字的民众也潜移默化接受了儒家的影响，几世同堂，聚族而居。

总之，尽管在不同阶层身上的影响各有不同，儒学总体上渗透了汉家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地方秩序、人才选举等。东汉的兴衰不是前汉的简单延续，而是发生了质变，是一种“旧邦新命”。



张向荣，文史作家，著有《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等。



《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张向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就是东汉。

关于东汉的书现在已经不少了，但普通读者对东汉依然感到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太过注重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概括东汉历史。例如中学教科书描述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与类似的历史叙事很多。我认为，理解东汉当然需要这类简单的、框架性的概括，但要让读者记住这段历史，主要还是应具体描写这段历史中的具体人物。

从东汉的盛衰可以看出，儒家经学既是东汉崩坏后迟迟难以统一的内在原因之一，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虽然分裂但蕴含着再度统一的文化基础。而这种辩证统一的张力，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 我对苏东坡的钦佩和亲切感与日俱增

艾朗诺

继《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以及《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又推出我论述宋代文化与文学的第三部译本：《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意象行》，让我深感荣幸。

这本书英文原作199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我的写作更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美国学界有许多学者研究宋代，但研究宋代的非常少。我第一本书写欧阳修，接着自然就想到了苏轼。而自从林语堂1947年出版《苏东坡传》（英文书名《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后，就一直没有人再发表关于苏东坡的专著。林语堂的那本书不但已经绝版，并且一看书名就知道过时了——gay这个词已增添了新的含义，书名容易引起当代西方读者对苏东坡的误解。何况林语堂那本书的缺点不限于书名。30年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仍是英语世界唯一全面介绍苏东坡的专著。我感到有必要重新评估苏轼。

当时北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时兴细致文学，至于作者的生平、时代、政治

及社会背景都可以完全置之不论，对于传世作品丰富的作家，更是倾向于聚焦某一种文体——治诗的诗论诗，治词的只论词。我的这本书名《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则表明它不顺应这潮流。因为我认为研究苏轼须尽量从各种角度审视他，他不仅是个文学家，也是个出色的政府官员。他不但作诗填词，还从事书论、画论、经学注疏，并产生大量的策论。他自己的字画也精妙绝伦。他在产生创作冲动的时刻，常用各种文体反复描绘同一事物，所以他的各种载体的创作是可以彼此参照着加以理解、审视和研究的。

再者，苏轼许多作品都与他的仕途有关。王安石变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轼仕宦、人生与思想、学术、文艺的走向。脱离变法来研究苏轼，必然无法触及他人生和创作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苏轼虽因屡次被贬而无法施展他的抱负，但他的政绩却是很可观的。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当然是他在杭州建了“苏堤”。苏堤不但疏浚了西湖的淤泥，为沿湖农民借灌蓄淡水，而且雇用了数万灾

民，让他们有生计。钱哪来呢？苏东坡想得很周到，他请求朝廷允许杭州发度牒（出家证书）。宋代的度牒是值钱的，许多富户为逃避赋税买度牒。筑堤的经费便有了。苏轼不但为官时有政绩，即使在流放期间也办了不少造福人民的事。如在惠州他鼓励鄂州太守向富裕家庭募捐，帮助有新生儿的贫困人口；在惠州动员士绅筑桥，并在惠州秘密向地方官献计怎样把山泉水引入广州，确保广州市民饮水安全。苏轼的动机不是为了施展才华以受表扬，而是主要出于佛教的慈悲心肠，所以我力图展现东坡百相。

如今回头看，这部论著也有可提升的空间。我当时主要根据《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和各种当代选本理解苏轼，没有多少注释可参考。坦白地说，并不能全读懂，只能在读懂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论述。现在有了20册的《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如果重写的话，至少材料会更丰富些。我最近准备出一部共有四册的中英对照苏轼选集，不拘文体，依写作年日排列，发现许多从前忽视的亮点，对苏轼的钦佩



艾朗诺，曾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现为斯坦福大学汉学教授。《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意象行》艾朗诺著 赵惠俊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和亲切感与日俱增。因熟知翻译的种种甘苦，我对此书译者赵惠俊特别感激。《散为百东坡》中文版能在2024年上海书展前与中国读者见面，他功不可没。最后，希望这片曾滋养苏轼的土地上，有更多读者与我一起再度享受苏轼的文采和幽默感，领会他的智慧和慈悲胸怀。

# 通天之学

江晓原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首任系主任，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

——即包括灵台、仪象、占星、望气、颂历等在内的一整套天文学事务。帝王拥有了自己的天学事务方才能够昭示四方，自己已经能与上天沟通；而能与上天沟通的人方才能够宣称“天命”已经归于自己，因而才有为王的资格。帝尧、舜为什么要将安排乃至亲自从事天学事务作为头等大事，原因正在于此。

正因为天学与王权在上古时代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必须由王家垄断。也正因此，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即申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故而王家天学的神圣地位一直维持到清朝灭亡。

关于中国天学的起源，学界一直有各种形式的天学西源说，但只要大家了解中国古代天学与王权的相互关系，就会知道在华夏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天学，它只能与华夏文明同时诞生，不可能是后来才被输入的文化。

然而，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成熟，与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改变一个陈旧的观念，即认为祖先将自己的东西传播给别人就是光荣，而接受别人传播来的东西就是耻辱。事实上，中华民族从来就是胸怀博大而坦荡的，从来就乐于接受外部的新知识，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传统之一。

六朝隋唐时期可以视为西方天文学向中土传播的一个高潮。这次高潮中西方天文学知识主要以印度为中介，伴随佛教的东来而传入中土。一些最重要的有关文献，就是直接以佛经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元代至明初，被认为是中西天文学交流的又一个高潮。这次西方天文学以伊斯兰天学为中介，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崛起，再度进入中土。下一个高潮出现于明末。这一次西方天文学不再依赖任何中介，被耶稣会传教士用作在中国传教的教学工具，直接大举进入中国。

然而，我们千万不可被上面三次高潮的说法框住了思路，以为除此三次高潮之外，历史上的中西天文学交流就无多可言了。事实上，以往数千年来，中西方的天文学交流一直在进行着。特别是早期的交流，我们今天所知的一些线索，很可能仅仅是冰山之一角。

天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今天谈论它，以什么形式最为合适呢？是“天学史”，还是“星占学史”，还是“天文学史”？笔者自从1990年撰写《天学真原》一书开始，在书籍和论文中就大量使用“天学”一词——这当然不是因为喜欢标新立异，而是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而此后这一措辞也逐渐被一些同行学者所使用——所以本书以“天学史”命名，同时，从天学的“通天者王”的功能性出发，为本书取名《通天》。

帝王必须拥有通天手段，其王权才能获得普遍承认。而在古代的各种通天手段之中，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种正是天学



江晓原

《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江晓原著 中华书局出版

我从事学术研究40余年来，先后出版过关于古代中外天学之书不下十种，都是根据自己当时的研究兴趣和成果而作，所以内容各有侧重。近承中华书局雅意，希望我能够为中国传统天学提供一本内容全面、结构紧凑，文本又适应较多读者阅读需要的雅俗共赏之作。这个想法非常好，我很乐意地答应了，于是经过两年的撰写和打磨，书稿于2023年9月交稿，于2024年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

长久以来，“天文学为农业服务”的说法为人们习知，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考古证据，都表明农业的历史比天学的历史要久远得多。也就是说，早在还没有天文学的时代，农业已在发生、发展着；而天学产生之后，也并未使得农业因此而有什么突飞猛进。换言之，即使根据现代的知识来看，农业对天学的需求也是极其微小的，对于节令的掌握无须非常精确，出入一两天并无妨碍。同时，如果以农业需求作为中国古代天学的出发点，则天文学为别的对象服务的可能性，就被遮蔽了，甚至完全被排除在思考范围之外。

事实上，天文学在古代中国是作为另一种活动的工具而存在的。另一种活动是什么？这就要从天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负担的神圣使命和哪些人需要天学谈起。

《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象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也明确说明，需要天学的是帝王和圣人，是他们要从“天垂象”中“见吉凶”。

上古帝王们需要天学，当然不是因为“热爱科学”，也不是为了帮助农民种地。那么这备受重视的天学，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然而却长期被天文学专家和史学家所忽略的问题——通天的手段。